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 嘉庆以来 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

罗检秋 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 嘉庆以来 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

罗检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罗检秋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ISBN 7-300-07225-9

I. 嘉…

II. 罗…

III. 汉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K249.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6945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

罗检秋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6.62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60 000

定 价 33.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委 员

龚书铎 王思治 经君健 程 歆  
杨 珍 夏明方

# 总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20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

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做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 and 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含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定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来说，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是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惟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分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

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3年8月8日



汉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目前关于清代汉学的研究偏重于“乾嘉学派”，对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学术分派及代表人物的讨论较多，但涉及嘉庆以后汉学的论著则很少，虽有一些论文，而专门著作一直阙如。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一书（以下简称《汉学》），着重对嘉庆以来的汉学传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弥补了这一领域的薄弱环节。

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有创新和发展，而其表现形式不一。就其主要而言，一方面，一门学科的建设离不开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研究者不断地发掘被人忽略或涉及较少的研究论题，增添新的知识内容；另一方面，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往往可以产生一些独到的发现，从而深化、推动原有的研究。《汉学》一书偏重于后者，其研究视角和思路较有特色。该书没有局限于评述主要汉学家的经历及其学术成就，而是在阐释汉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众多汉学人物和著作的研究，系统地梳理汉学衍变的脉络。全书从对“汉学”一词源流的考察，从对“汉学传统”的剖析和总结入手，从而建立其具有特色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例如，人们一般都认识到，学术的变化、发展既有内在原因，又有外部机缘，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有意义的。正因此，近年一些学者常常提到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但如何结合，仍然是有待探索的课题。目前一些论著注意的“社会史”背景多集中于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或者是宗族环境，而对直接影响传统士人的文化环境研究不多。《汉学》一书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一章从学术理路分析乾嘉之际汉、宋之学由对峙转向调和、融会的过程，也考察了清末古文经学的义理化趋向，从而较深入地揭示和诠释了汉学蕴涵的调适传统。而该书第二章、第三章则主要考察汉学衍变的外部机缘，通过考察嘉庆以来趋于活跃的士人交游、不同学术流派（汉学与宋学）的互相影响，展示了经世学风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同时，作者又从汉学群体的观念、知识系统、研究方法等方面，研究汉学面对西学东渐的种种变化，综论汉学与西学的调和、融会趋势。这样，作者通过不同的视角，较全面地揭示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既有分析学术逻辑的实例，又研究了学术转变的文化环境。

学术研究贵有创见，该书对一些存在分歧或已有定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关于嘉道年间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学术界认识不一，近年的讨论尤其突出了分歧的存在。该书主要不是从政治因素或个人经历而论今文经学的兴起，而是基于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从汉学的义理需要中考察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见解富有新意。

关于清末学术格局，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经学是相对衰落了，但仍具有一定意义，对于非经学领域的认识和研究则不无分歧。大致说来，人们往往过于强调“新史学”的重要性。在当时的中西对比中，中学或者说传统学术仍占主流地位。无论是较为传统的史学考据，还是融合中西的“新史学”，都没有成为清末学术的惟一中心。而且，在这些原有的学术领域之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潮，如国学、国粹等等。《汉学》一书考察了清未经学与史学、诸子学等领域此消彼长的局面，深化了对清末传统学术多元格局的认识。又如，书中通过对国粹派与官方“国

学”、清末民初“国学”与“国故学”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其中的思想差异和共同的学术基础，有益于进一步认识清末汉学的传承和影响。同时，该书也没有局限于研究清代汉学传统本身，而以今、古文经学为中心勾勒了汉学与现代学术的密切联系，从而凸显了清代汉学传统的影响和现代意义。书中这类见解颇多，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清代汉学流派众多，头绪纷繁，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分析颇为不易。《汉学》涉及的人物甚多，而重点探讨了常州学派、维新派今文家、国粹派古文家、清末正统汉学家等多个学术群体，不仅涉及以往颇受注意的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而且考察了许多目前研究不够的汉学家如陈寿祺、刘宝楠、陈澧、邹伯奇、孙诒让、王闿运、王先谦、俞樾、叶德辉、苏舆等人的汉学特色及成就，涉及京师、苏、皖、湘、浙、闽、粤等地区。全书有宏观的综合，也有微观的剖析。这些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于拓展、丰富清代汉学研究不无裨益。当然，《汉学》一书所论未必都妥帖，有的地方也还可以进一步深化。

龚书铎

2005年12月

序 .....	龚书铎 (1)
导 论 .....	(1)
一、学术史与学术传统 .....	(1)
二、“汉学”的源流 .....	(7)
三、嘉庆以来的汉学传统 .....	(15)
第一章 汉宋趋于调和融合：以内在理路为中心的考察 ..	(31)
一、“盛世”的汉宋紧张与反思 .....	(32)
二、嘉庆以来的汉宋调融 .....	(51)
三、今文经学的兴起与发展 .....	(84)
四、清末古文经学的义理化 .....	(125)
第二章 汉学走向经世致用	
——侧重于士人交游与学术互动 .....	(154)
一、乾隆年间经世思想的余音 .....	(155)
二、京师士人的修楔雅集与经世意识的觉醒 .....	(164)
三、经世学风的传衍：以常州为中心的考察 .....	(195)

四、转向经世的道咸汉学家·····	(220)
五、同光年间：经世学风趋于强劲·····	(237)
六、清末古文家与经世学风的拓展·····	(259)
<b>第三章 西潮冲击下的汉学·····</b>	<b>(293)</b>
一、观念：与时俱进及其限制·····	(293)
二、知识：从科技到人文的汲取·····	(320)
三、方法：中西交融的深入·····	(332)
<b>第四章 汉学传统与学术多元化·····</b>	<b>(362)</b>
一、求真与存疑·····	(362)
二、清末学术的多元化·····	(373)
三、学术平等精神的彰显·····	(403)
<b>第五章 清季民初实证学风的传承·····</b>	<b>(408)</b>
一、“国学”的学与思·····	(409)
二、根柢于汉学的“国故学”·····	(434)
三、民初汉学遗风：主要流派及成就·····	(445)
<b>结 语 汉学传统与现代学术·····</b>	<b>(476)</b>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500)
附录二 重要名词索引·····	(510)
后记·····	(521)

汉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目前关于清代汉学的研究偏重于“乾嘉学派”，对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学术分派及代表人物的讨论较多，但涉及嘉庆以后汉学的论著则很少，虽有一些论文，而专门著作一直阙如。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一书（以下简称《汉学》），着重对嘉庆以来的汉学传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弥补了这一领域的薄弱环节。

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有创新和发展，而其表现形式不一。就其主要而言，一方面，一门学科的建设离不开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研究者不断地发掘被人忽略或涉及较少的研究论题，增添新的知识内容；另一方面，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往往可以产生一些独到的发现，从而深化、推动原有的研究。《汉学》一书偏重于后者，其研究视角和思路较有特色。该书没有局限于评述主要汉学家的经历及其学术成就，而是在阐释汉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众多汉学人物和著作的研究，系统地梳理汉学衍变的脉络。全书从对“汉学”一词源流的考察，从对“汉学传统”的剖析和总结入手，从而建立其具有特色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均缺少新意。那么，如何寻求学术史研究的转机？清代学术主流汉学（或曰考据学、朴学）是一个较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而乾嘉汉学本身的演变历程也不无启示意义。学贵专精，而“专”与“通”却是相互补充且不可或缺的。现代学术史家张舜徽指出：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sup>①</sup>

这里虽就清代汉学而论，却也适用于反思学术史研究本身。20世纪以来，学术的专门化成为潮流，这对弥补传统学术模糊、笼统的缺陷无疑具有意义。但学术“专门化”与“通识”并不矛盾，更不能流于固守狭窄的学术领域。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固不可少，但如长期局限于一人一事，则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学者评价以往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云：思想的历史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一半仿佛编花名册，把已经逝去的天才的生平与著作一一登录在案；一半仿佛挂光荣榜，论功行赏或评功摆好”<sup>②</sup>。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评价，但这确实触及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事实上，学术史研究也存在类似缺陷。当人们逐渐认识其局限之时，必然进而注重贯通的研究。于是，近年海内外关于清代学术流派和区域的研究方兴未艾，诸如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湖湘学派、岭南学派、浙东学派均有不少成果。与此

<sup>①</sup> 张舜徽：《清儒学记》，378～37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

<sup>②</sup>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较贯通的清代学术史著，如儒学史、经学史、诸子学史、史学史、佛学史、西学东渐史等。这些史著为贯通地认识和把握清代学术开辟了新的视角，多少具有博通的特征。

学术研究既需实证，又不可能完全排除义理。即使看似狭窄的考据研究，也可能包含一定的思想主旨和学术精神，后者对贯通地认识学术的传承和衍变尤具意义。多年来，海内外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宋明以降的中国学术纳入“道问学”与“尊德性”两大系统来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一些研究者把清代汉学归于“道问学”一类，虽然彰显了汉学的知识谱系，但对汉学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缺少注意和总结，对汉学传统的变化也缺少研究，以致长期以来汉学在人们的观念中多为“烦琐考据”或“无用之学”。清代汉学研究有待突破，汉学本身的内涵也需要重新认识。进而言之，学术史、包括清代汉学的梳理和诠释不能长期偏重于知识系统或“道问学”层面，而应发掘、阐释其“尊德性”内涵，彰显其思想意义和学术精神。

不难发现，一些学术流派在长期衍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基于具体内容之上的价值取向、精神特质和研究范式，可称之为“学术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就是一个持续的热门议题。传统是一个现代概念，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多年来，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传统进行了诠释和定义。有的注重传统的民族性及“传统”一词的使用：“（一）为了与新近出现的事物相区别，而把以往既有的事物加上传统的字样。如与现代艺术相对的有所谓‘传统剧’、‘传统音乐’之类。（二）是指一些历史悠久的东西，如把对父母、长辈的孝敬称为传统道德等等。（三）与外来的事物相区别，而把本土固有的东西称之为‘传统的’，如所谓‘传统医学’（即中医）、传统工艺之类。（四）传统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他有自我维系和统摄能力，因而稳固、有惰性。人们常讲的传统观念、传统习俗就主



要体现这一层意义。”<sup>①</sup>有的侧重于总结传统的精神特性：“传统，有世代相继之义。佛教有衣钵相传的‘法统’，儒家有圣贤相传的‘道统’，都与‘传统’意义相类。”而现代意义上的传统，“是指由历史沿传而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思想、道德、风俗、心态、艺术、制度等，是一个外延最宽、反映客观事物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sup>②</sup>。这些论述代表了20世纪末年中国学者的认识主流，涉及“传统”的宽泛意义和诸多特性，但基本上把“传统”视为具有民族性的精神文化，凸显其过去特征和稳定性。

正因此，一些学者注重考察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方面，甚者视之为现代化的障碍。按余英时的说法，这种看法尚未走出韦伯的思想窠臼。他说：“自从韦伯（Max Weber）在他的历史社会学中提出‘传统’与‘现代’两大范畴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家一般都倾向于把‘传统’看作是‘现代化’的反面。‘理性’、‘进步’、‘自由’等价值是‘现代’的标帜，而‘传统’则阻碍着这些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sup>③</sup>这是余氏多年一贯的思想见解，也体现了世纪之交海内外学者的学术反思。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逐渐注意传统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有的学者侧重于彰显传统的遗存性：“‘传统’虽然产生在过去，但必然是仍然影响甚至决定着今天生活的东西。”“‘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传统’即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

<sup>①</sup> 耿云志：《论传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5），北京，中华书局。

<sup>②</sup> 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形成和演变》，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sup>③</sup>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卷前，“自序”，7~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